

● 医学与科普

科普作品的“真”与“深”

▲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 刘端祺

一年前，为纪念中国抗癌协会成立30周年筹划出版《癌症知多少》丛书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我和其他筹办医生面前：在互联网蓬勃发展，各种“科普资料”唾手可得的当今，再编写像肿瘤科普系列丛书这样的科普书籍，会有读者吗？

为此，我们咨询了一些医学同道、肿瘤患者和不同年龄的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们，反馈基本是正面的：当下确实有多种快捷途径可以获取肿瘤知识，但在这种“信息爆炸”中被误伤，乃至受骗上当被“躺枪”的读者也不在少数。人们迫切需要一套由专业人士撰写内容较为系统全面、可信度高又接地气的高质量科普读物。

刚性作品有其两大特征

近30年来，我国的肿瘤发病率迅速上升，肿瘤病谱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多发的胃癌、食管癌、肝癌等消化道肿瘤还没有明显减少，肺癌、乳腺癌、大肠癌等肿瘤的发病率又明显提高；在年轻肿瘤患者增加的同时，老年肿瘤患者的总人数依然居高不下。

这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肿瘤病谱共存的局面，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广大群众迫切需要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了解他们过去不熟悉、甚至闻所未闻的新老医学名词和肿瘤防治知识。因此，对健康科普书籍尤其是肿瘤科普书籍的需求，是一种长期的刚性需求。

那么什么是满足患者及其亲属刚性需求的“刚性

作品”？在主编丛书《老年肿瘤知识问答》分册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的是两个字：“真”和“深”。

所谓“真”就是真实的内容，认真的态度，而关键是要有一颗真诚的心。

作为编写丛书的主力——在繁忙的临床一线工作的年轻医生们，大多是第一次“科普”，第一次尝试给“长辈们”写书，必然力有不逮，青涩难免。科普作品的写作技巧固然是质量的保障，但作者以一颗真诚的心寻找到的和长辈们的共鸣；寻找到的和读者面对面娓娓道来真诚对话的共情，才是一种“大象隐于无形”的成功。正是这种真诚，促使作者们决定以“问答”这种比较容易读懂的形式撰

写，而且设问大多来自临床一线患者最常咨询的、重复率最高的问题，回答则力求体现出对提问者的尊重和设身处地的共鸣与共情。

所谓“深”则是指作品内容要有深度，深入浅出，言之有物。

科普作品同样需要忠于科学原则，不能因为是科普就落入俗套，甚至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时代在变，读者接受各种资讯的渠道众多，科学文化水准正在迅速提高，对科普作品的要求也在提高。这就要求科普作品跟上当代学术发展的脚步，用非专业人士也能听得懂的语言，反映出最新科技发展在肿瘤防治领域的成果，使读者真正做到开卷有益。

希望与挑战并存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这样的科普丛书：比互联网上的消息要“真”，比一般科普小册子的内容要“深”。既能符合传统阅读纸媒读物的习惯，又能成为介于浅显科普读物和艰深专业书刊之间的桥梁；既有助于患者及其亲友对肿瘤的认知，又能使青年医务工作者在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得到启发。

对以医生为专业的科普作者而言，这是一个分寸拿捏难度极大的挑战。但只要不断探索与琢磨，一定会呈现越来越多的好的科普作品。



■ 相关链接

在纪念中国抗癌协会成立30周年的特殊时刻，中国科协能力提升专项资金支持、中国抗癌协会组织实施的总字数达1700多万字的“常见癌症诊疗系列丛书”，由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牵头、数百名专家学者集体编纂完成，于日前顺利出版面世。丛书卷帙浩繁，包括“专业版”9个分册和名为“癌症知多少”的“大众版”科普系列丛书共12分册。

丛书将配合中国抗癌协会每年的世界癌症日、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等品牌活动，以及肺癌、乳腺癌关注月等各类单病种的宣传活动，通过讲座、公益发放等形式，传播抗癌抗癌新知识，普及科学合理的规范化治疗，为推动我国癌症防控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赵勇）

●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薛全福：25年肺动脉高压和肺心病研究的快乐

▲本报记者 陈惠



84岁的薛全福教授说他一辈子都在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这是他们这一代研究者的命运，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成就了自己，成就了中国基础医学研究。

1956年，刚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薛全福赶上了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被分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医科院”），跟随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华光，从事病理生理和放射医学方面的研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开展三线建设，实验所等迁往四川省简阳县，薛全福属先头部队，在四川待了12年。回忆最初的那段时间，他无不感慨地说，那是个“电压不稳，水管里时常流出小鱼和水草”的地方，日用品极度匮乏，更不用说实验用品。在这样的条件下，研究工作在困难中维持。

1970年，国务院直接领导开展攻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和呼吸四病“感冒、慢性支气管炎（慢支）、肺气肿和慢性肺心病”的防治研究。薛全福等人在附近农村和工厂设立慢支防治现场，开展病因调查，利用当地中草药进行防治，同时与病理系合作开展实验研究。

1978年，基础所迁

回北京后，他继续肺动脉高压肺心病发病机制的研究。薛全福发现国内外文献多数是研究各种体液因子的变化对肺血管作用，他决定从另一角度，对肺和肺血管本身变化进行研究，并以对气道和血管具有多种生理调节功能的肾上腺素受体为切入点。

1981年，薛全福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

医院呼吸内科从事研究，他建立了用核素心影图测定右心功能的方法，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动脉高压、肺心病患者右心功能的变化及氧疗和药物防治作用，期间还发现一种新的β₂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能提高这类患者右心功能。此后，他又赴瑞士巴塞尔山度士药厂临床前研究部，专门学习并

建立了利用放射性受体配基结合法与自显影技术相配合，测定肺及肺血管内α及β肾上腺素能受体的方法，用该厂Engel博士首创的“高比放射性和高特异性”β₂受体的配体，及另一α受体配体，首次显示两种受体在肺气道和血管上的分布，攻克了无法在肺内气道和血管上定量研究受体变化的难关，取得开创性成果。

1982年，他带着自费购买的特殊仪器和设备回国。和同事们一起形成了阜外、协和医院和基础所的大协作，成立了医科院肺和肺循环研究中心，研究肺动脉高压的发病机制和防治，直到退休，长达25年余。肯定了肾上腺素α受体增多和β₂受体减少，是肺小动脉收缩和结

构重组，从而形成肺动脉高压的机制，并提出相应的防治药物。还在基因水平作了探讨，受到学者重视。

退休后的薛全福常与王振纲教授一起参加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办的会议，2009年国际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研讨会上，他们还作了“T型钙通道拮抗剂和高血压”的专题报告。有一年，论坛设置了肺动脉高压分论坛，薛全福作为讨论嘉宾早早赶到会场，却发现会场里只有不多的几名参会医生，而国外的主持及演讲者全部到齐。这种鲜明对比让薛全福感到十分痛心。他说，肺动脉高压是高血压相关疾病，遗憾的是，当时很少有医生能够意识到。（节选自《医师报》社《中国高血压防治追梦半世纪》）